锐意求索的有益尝试

——《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读后

袁森坡

最近，笔者怀着喜悦的心情，读了马汝珩、马大正同志合著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集中收录了论文十五篇，共二十二万字。从发表的时间上看，是作者自1978年至1982年期间，锐意探索厄鲁特史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们从已经发表了的论文中精选的一部分。

一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重要的一支。清代前期，厄鲁特四部中的准噶尔统治着天山南北；和硕特部统一过青海和西藏；杜尔伯特部在乾隆时又被清朝安置于漠北科布多地区；土尔扈特部则远徒于伏尔加河下游。厄鲁特四部活动的地域如此辽阔，其故土天山北路又位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所以开展对厄鲁特史的研究，对于探讨清史、西北边疆史、民族史、中亚史、中俄关系史、中西交通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于厄鲁特史的研究，八十年来，我国学术界经历了一个由沉寂到复苏和发展的过程。从本世纪初到解放前的几十年间，学术界对厄鲁特史的研究，几乎是处于落寞状态，在涉及到厄鲁特史的六十余篇论文中，以厄鲁特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仅一篇。从建国至六十年代初期，因厄鲁特史与中俄关系史密切，学者们考虑到政治上的风险，大都视为畏途，不敢问津。这一阶段仅出现论文约十篇。六十年代以后，历史的发展演变，使得有关我国北部疆域、民族问题的课题，成为史学界亟待加强的工作，可是，由于与厄鲁特史有关的诸学科成果尚少，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自然也难以深入。1977年以后，神洲大地江河解冻，万物复苏，在厄鲁特史研究的领域里，也呈现出蓬蓬勃勃的生机，相当一批作者辟草莱，斩荆棘，辛勤耕耘，向读者奉献了一百四十余篇论文和某些很有影响的译著，但作为《厄鲁特蒙古史论集》的采撷英华，集锦出版，则是厄鲁特蒙古史学界的一次创举。它标志着厄鲁特史学已从探索阶段向纵深发展，开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预言，随着这簇花蕾的绽开，厄鲁特史的天地里必将是奇葩竞采，日新又新，会涌现出更丰硕的科学成果。

二

作为我国学术界的第一部《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作者的主要笔力用在评述人物的活动及事件的演变上，作者的视野涉及到了许多有影响的厄鲁特代表人物。从历史科学的发展规律来看，这是必然的，"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第 1 卷26页)研究主要人物体现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研究他们的活动和倾向，探索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产生过哪些决定性的影响？是搞清历史发展脉络的必然过程，也是深入研究阶级状况，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宗教意识、文化艺术、语言风俗，心理状态等上层建筑领域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评述人物入手来打开厄鲁特史的广阔天地，路子完全对头。

过去，学术界在研究厄鲁特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时，或由于民族感情的不同，或由于掌握史料的差异，研究者往往出现尖锐的分歧，如对噶尔丹，阿睦尔撒纳这样的人物，得出的结论迥然相异。应当怎样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呢？列宁指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拥护一般'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19页)《论集》将列宁的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结合清代前期沙皇俄国蚕食侵略我国北疆的特殊历史条件，化成了评价人物的三条基本原则：凡是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有利于本民族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反沙俄侵略势力的斗争，则肯定之，褒扬之；否则即予以揭露和针砭。《论集》肯定顾实汗、咱雅班第达、巴图尔珲台吉的业迹，赞美杜尔伯特部三策凌反对分裂混战、促进祖统一的正义行动，歌颂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率属返回祖国的大智大勇，从立足点和出发点看来，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而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和硕特部的罗卜藏丹津、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等人，或勾结沙俄，妄图依靠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主宰蒙古各部，或在清朝已经统一青藏高原之后制造分裂，梦想倒传历史的车轮割据一隅；或先假手清军翦除政敌，再煽动叛乱；但是，他们的行动违背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潮流，不符合厄鲁特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结局都是众叛亲离，必然失败。作者对他们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对于澄清历史真相，正确地评价人物的功过是非，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作者模棱两可，闪烁其词，读者就会陷入是非莫辨的历史云雾之中。作者在研究问题时，还力求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注意到了"论从史出"，用史实说话，注意到了把握人物的分寸感，防止脸谱化，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立论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推敲，从而获得了科学的生命和魅力，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如果说《论集》中关于人物的评价，每篇都有自己的特色的话，下述三篇还值得我们予以应有的注意。

在《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评述》一文中，作者依据蒙文本《咱雅班第达传》，对出身于和硕特部的杰出学者、政治家宗教领袖咱雅班第达的生平和事业，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众所周知，自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皈依黄教、其曾孙云丹嘉措被确认为达赖四世以后，黄教迅速风靡漠南和漠北。但是，黄教是怎样打开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壁垒的？西蒙古封建主为什么会与黄教结下不解之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是若明若暗，不甚了了。《评述》一文填充了这块空白，为读者勾勒了黄教传入厄鲁特蒙古的经过，介绍了咱雅班第达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的亲密关系，论述了咱雅班第达一生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生活。从而令人信服地说明：黄教在其统治全蒙古的"精神征服"过程中，除了欺骗性，麻醉性的一面之外，还有传播藏医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贡献，起过消弭战乱、稳定社会生产的积极作用。作者的学术实践，为我们评价黄教的源流，影响和作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态度。

和硕特蒙古顾实汗图拜琥，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蒙藏关系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顾实汗生平述略》一文，全面地阐述了顾实汗五十五岁（1636年）以后的三大业迹：结束了明末以来青藏高原的战乱割据状态，加强了蒙藏两大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争取并加强了青藏地区与清朝中央政府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述略》博采旁搜，精于考核，引用了资料、档案、论著二十余种。特别是顾实汗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1606年至1636年）这一段

的经历，作者利用了俄文档案和西方学者的著述，作了明晰的介绍，补充了汉文文献的不足。

《略论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奠基人——巴图尔珲台吉》一文，是《论集》中的一篇力作。该文指出：巴图尔珲台吉结束了厄鲁特与喀尔喀两大部之间长达一百余年的纷争，支持并参加了顾实汗进军青、藏的行动，主持制定了19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坚持了反抗沙俄侵略的民族立场，积极发展了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贡使关系。巴图尔珲台吉还努力学习定居民族的物质文明，在准噶尔苦心经营城镇居民点和发展农业、手工业。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经济措施，为准噶尔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存在，有力地遏制了沙俄的扩张，为清朝最终统一西北疆域铺平了道路。论文有理有据的分析，使我们对准噶尔的政权的形成和发展，在认识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

《论集》在人物的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土尔扈特部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诸如谱系、回归祖国的动因和悲壮历程，渥巴锡汗的卓越才干和不朽功勋，清朝的民族政策、回归人数的考析等等，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土尔扈特部从天山以北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游牧，在寄居异乡一个半世纪以后，为了摆脱沙俄的压榨，保卫民族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利，在民族英雄渥巴锡汗的精心组织下，土尔扈特部十六万八千余人破釜沉舟，冒着严寒、冰雪、酷署和干旱，用战刀杀开一条血路，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夏季回到了祖国怀抱，沿途死亡过半，多达十万余人。土尔扈特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前仆后继、誓返祖邦的英雄壮举，在历史上引起巨大的震动，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页。但是，中外学者在有关土尔扈特的记载和研究上，有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舛误错谬、互相抵牾之处也较多。因此，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真相，荡涤唯心主义的污泥和尘垢，遂成为研究土尔扈特史的重要课题。《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一文，引用了俄文档案、托忒文资料、满文土尔扈特档案及其中外史籍，对翁罕至渥巴锡之间谱系的缺遗作了精细的考订，对散札布、沙克都尔札布、车楞敦噜布、敦罗布喇什等人的活动，渥巴锡仲兄萨赖作为人质而死于俄国的情况，也作了补叙。关于阿玉奇汗时期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关系的变化，阿玉奇死后，土尔扈特贵族争夺汗位的斗争，沙俄利用矛盾加强其控制的过程等问题，也作了必要的阐述，从而弥补了汉文资料的阙漏。《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一文，以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史诗般的语言，震撼人的逻辑力量，暴露了沙俄的残暴、贪婪和狡诈，赞美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人的坚魄、机智和刚毅，揭示了土尔扈特人民爱国行动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所以论文发表后史坛反映良好，文坛上也随之涌现出一批歌颂土尔扈特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一文，回顾了乾隆皇帝力排众议、决策收抚土尔扈特的曲折过程，剖析了封建统治者“众建而分其势”、“兴黄教安蒙古”、“因其俗而统驭之”的阶级实质。《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析》一文，以确凿的档案材料，说明土尔扈特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时为33361户，168080人；返回祖国后为15793户，66073人。肯定了俄文档案、托忒文资料、清朝官方记载的基本正确，并指出了西方学者记述混乱和椿园（七十一）提法不足信的原因，这几篇很有见地的论文，对于推动学术界关于土尔扈特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四

从文献学和信息学的角度来看,《论集》也颇具特色，值得一提。

《论集》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悠长岁月里，厄鲁特四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四部与喀尔喀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满、汉等民族的交返也极其密切。遗憾的是，在十七世纪前半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即从明清交替之际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的一个多世纪里,有关厄鲁特四部的汉文、满文史料比较有限，这就给我们研究厄鲁特史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作者为了揭示厄鲁特史的奥密，在资料的收集、翻译、鉴别、归纳、考订、利用上，下过极为扎实的功夫。首先，作者认真读了汉文史料、方志、著述、笔记、档案；其次，作者利用了苏联出版的有关厄鲁特史的俄国档案，认真地研究过俄国及苏联学者的大量著述；第三，作者广泛地阅读了日本、英国、法国学者们的造诣很深的著作，也借鉴了意大利、法国、瑞典某些学者的成果。第四，尽可能地利用了民族文字资料、在利用托忒文、满文、蒙古文、维文的档案、著作、手稿本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我们检索一下作者所利用的书名目录及所属语种‘可以看出，其中不少在史料国内是首次被采用，从目前我国研究厄鲁特史的现状来看确实有“新”和“全”的特色。《论集》中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深度和力度，除了观点鲜明、思维周密，语言洗炼，论证严谨等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作者占有大量的经过认真研究过和消化过的史料。否则，再好的议论也是虚飘浮泛的空中楼阁，不可能具有说服人的力量。

注意把握研究动态，提供学术信息，是《论集》的又一个特色。由于有关厄鲁特史的各种文字的资料浩如烟海，中外学者的著作也难以尽述，所以，不但史学爱好者因茫无头绪而望洋兴叹，专业工作者也往往会因为不解了解国外的进展情况而走弯路。《论集》中《苏联史学界利用俄国档案研究准噶尔历史概述》、《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简述》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苏联研究准噶尔史的发展梗概和著名学者的著述情况，介绍了我国（包括清代，解放前、后、日本、俄国（包括苏联)、西方（英、法、德、美等）四方面研究土尔扈特史的发展脉络、学者生平、代表著作、相互关系。两篇文章条理分明，纲举目张，可以说是作者“溯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后的读书总结,也可以说是二篇有关厄鲁特史的《书目答问》,是打开厄鲁特史堂奥的钥匙。其价值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五

《论集》成绩斐然，但无庸讳言，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不足。

《论集》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其中又以评价人物和分析事件为主，在一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选题上的局限性无可非议。不过，就读者来说，还希望了解到厄鲁特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状况，了解厄鲁特四部与我国其它兄弟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汉、满、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发展关系。《论集》在分析人物和事件时已有所介绍，在《论准噶尔贵族对南疆的统治》一文中，也从政治史的角度专门研究了准噶尔贵族奴役压榨维吾尔族的问题,打开了厄鲁特的南部窗口,展示了厄鲁特史的一块新天地。如果能加强厄鲁特民族与其它民族的相互关系的全面研究，厄鲁特史的纵向感和立体感将会充分显示出来。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正是在“抽刀断水水更流”、“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

《论集》注意到了老沙皇对我国侵略扩张的实质，并作了应有的揭露，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厄鲁特四部与沙皇俄国的关系，除了反抗其颠覆、渗透、蚕食、兼并的一面之外，也还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关系。在土尔扈特史的领域里，也应该揭示土尔扈特人民与顿河、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2页、第3卷第38页)，渥巴锡领导的抗俄斗争是两年后普加巧夫起义的前奏，普加巧夫起义则是渥巴锡抗俄斗争的继续。充分地展示土尔扈特人民与俄国人民的关系，对于揭露沙皇政府凶残暴虐的统治实质和虚伪狡诈的卑劣伎俩，也是有利的，作者的论文中已开始这样做了，不过，在内容、分量、篇幅上，似乎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论集》在技术上也有某些美中不足之处，有的文章注释重复较多，有的文章还残存着七十年代文风的痕迹。在内容上，有的问题还应进一步探索（如土尔扈特的回归路线）；有的碑文拓片选用后，对其中大满族主义的糟粕应在行文加以剔除。不过，这都是白璧微瑕，无伤大体。我们期待着作者继续开拓厄鲁特史的领域，为开发我国辽阔广袤的西北腹地，从历史研究上予以配合，提供新的专著或论集。

旅日学者杨启樵博士到历史所座谈

现执教于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的旅日华侨学者杨启樵博士，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邀请，自七月十二日起，来华作八周的学术访问，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术机构和与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七月二十六日，杨启樵博士莅所与清史研究室的同仁们座谈，介绍了海外的清史研究状况，特别是台湾和日本的清史研究动态。他讲完后，与会者纷纷提出问题，气氛颇为热烈，历时两小时始散。

谈及台湾清史界的现状，杨启樵博士谦逊地说，《清史研究通讯》中多有报导，比如《台湾清史研究一瞥》一文中，就有详尽的叙述，毋须再作补充。然而，杨博士指出一点，台湾的印刷业比较发达，他们大量地影印和翻印史书典籍，虽然其中一部分出于商人的谋利心，且有粗制滥造的现象，但间接地助长了学术研究的发展。相形之下，内地的印刷缓慢，定期刊物多有脱期，这种情况亟待改善。

至于日本的汉学研究，杨启樵博士认为国内估价过高。实际上，日本学者的著作精粗不以，其中颇有不成熟的作品，读者不能囫囵吞枣，须仔细分辨。还有，日本学者不重视汉语，以致无法作深入的交流，这是一大缺点，但近年来颇有改进。以上是杨博士演讲的概略。

（梅岭）